

山西大同县东南部方言 及其变异研究

SHANXI DATONGXIAN DONGNANBU FANGYAN
JIQI BIANYI YANJIU

● 武玉芳 著

山西大同县东南部方言
及其变异研究

SHANXI DATONGXIAN DONGNANBU FANGYAN
JIQI BIANYI YANJIU

● 武玉芳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西大同县东南部方言及其变异研究 / 武玉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8

ISBN 978 - 7 - 5004 - 9021 - 0

I. ①山… II. ①武… III. ①西北方言 - 方言研究 - 大
同县 IV. ①H172.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62716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特邀编辑 成 树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 插 页 2

字 数 302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大同人民政府县长 孙永胜

方言作为语言体系中最基础、最活跃的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就非物质文化现象而言，方言更具体本体文化和载体文化的双重性，是研究某一时期、某一地域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方言的研究成果有助移民史、民俗学、地名学、地方戏曲等相关领域的研究。

大同县，桑干河畔的一方热土，历史上是大汉民族捍卫民族尊严、抵御北方外族入侵的兵家必争之地。在古代战争文化与民族融合文化的互动中，孕育了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大同县方言的形成，与本县历史、地理及民俗传统等诸多因素有着直接的关系。大同县方言土语已不仅是一种符号，更成为一种文化，从一个侧面承载着中国北方边塞文化、军旅文化、民族交融文化等珍贵的非物质文化。

近年来，大同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县上下呈现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政通人和、文化繁荣的大好局面。今日，欣闻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武玉芳博士撰写的《山西大同县东南部方言及其变异研究》一书即将出版，倍感兴奋。这不仅是地域方言研究的一项幸事，更是传承弘扬大同县地方非物质文化的一件大事。该书的问世，为我们研究大同县方言规律，通过大同县方言了解大同县、认识大同县、研究地方文化史，提供了一部不可多得的学术专著。从这个意义上讲，此书不仅是一部颇具地方特色的语言研究专著，也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地方工具书。该书的出版发行，必将为推动大同县文化事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发挥积极的作用！故于先睹这一著作之余而为之草序，以表祝贺！

2010年5月16日

山西北部大同方言研究的一篇力作

——《山西大同县东南部方言及其变异研究》序

塞外古城大同，曾为三代京华，两朝重镇，战略地位显要，自古为首都之门户，三晋之屏藩，中原之保障。史有“佛国龙城”之誉，今有“中华煤都”之称。1982年，大同市名列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这已足以说明大同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在大同方言的研究史上也有堪与其历史文化的辉煌相媲美之处：1910年，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来到中国山西大学堂任教，工作之余，调查了包括大同方言在内的山西7处方言，并写成《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1940年该著作在中国出版，标志着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汉语方言的开始。1941年，比利时神父贺登崧在传教之余，调查了山西大同、河北宣化等地的方言，在此基础上发表了多篇附有方言地图的论文（其中《大同市东南部方言中地域性语音变化举例》发表在1946年的*Monumenta Serica*杂志上），开启了用方言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汉语方言的先河，在汉语方言研究史上意义重大。贺氏记录了大同方言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特点，并据此划出方言边界线：大致向北延伸，略向东弯曲。无论高氏、贺氏当时调查的准确度如何，他们首次科学记音、用地理语言学的方法调查和记录大同方言，在汉语方言研究史上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虽然上世纪50年代末做过山西方言的普查工作，但没有系列成果问世。从高氏算起事隔70年，从贺氏算起事隔40年，直至20世纪80年代，山西方言的调查研究才掀起新的高潮，先后出版了《山西省各县（市）方言志》和《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等一大批重要的研究成果，这次调查高潮中，又有大同的马文忠、梁述忠二位写出《大同方言志》出版，对20世纪中期的大同方言进行了系统的描写，为进一步研究大同方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高本汉、贺登崧，再到马文忠、梁述忠，大同方言的研究经历了由国外学者独立调查到大同学者全面研究，由简单记录字音、词汇、语法现象到细致描写语言事实，发掘语言发展变化规律的过程。大同70年的方言研究史在汉语方言研究史上堪称世纪辉煌。

进入 21 世纪，大同的一批年轻的方言学者崛起，用多种研究方法，联系社会原因，探讨大同方言演变规律，武玉芳的博士论文《山西大同县东南部方言及其变异研究》（下文简称《变异研究》）是对大同方言的现状和历史的演变进行的新的探索和有益尝试的一篇力作。书中综合运用传统方言学、地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调查方法，对大同县东南部方言进行了全面的描写和分析，揭示了大同县方言的内部差异，并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分析大同县“入声舒化”的社会因素，并预测其发展趋势。其书主要有以下三个主要特点：

一、通过对方言小片的细致描写揭示了大同县方言的内部差异

以往的研究，多将大同方言作为一个整体，将其与周边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言比较，或对其进行历史探源。大同方言内部差异的研究并不多见。作者通过大量细致的田野调查，用平声分化、宕开三、合一、合三与江摄的分合、影疑母读音、深臻曾梗通主元音的鼻化四条标准作为分区依据，将大同县方言分为：东南片（册田话）、东北片（许堡话）、西南片（峰峪话）和西北片（西坪话），详细描写出大同县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差异，指出了大同县与大同城区方言的区别，得出大同县西部方言（峰峪话、西坪话）属大包片，东部方言（册田话）与张呼片相近，许堡话则处在大包和张呼两片的过渡地带，兼有两片特点的结论，为以后进一步研究大同方言的内部差异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二、从地理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的角度探讨了大同县方言的演变过程

高本汉和贺登崧记录的是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大同方言，迄今已有百年，马文忠、梁述忠记录的大同方言可反映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方言面貌，现在的大同方言现状如何，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问题在《变异研究》一书中都有较为详细的描写，书中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角度比较了大同县东南部方言与中古音的对应，分析了新老两派的主要语音差异以及四小片之间的语音差异。在翔实记录分类词表基础上，重点研究当地较有特点的词缀、分音词、合音词、副词和代词等词汇特点以及反复问句和体貌系统等句法特点，为我们展现了 21 世纪初期大同县东南方言的全貌，为大同方言专题研究和历时研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材料。同时，通过走访贺氏当时的发音人臧存明先生，订正了贺氏“把狼来了”实为“不（了）狼来了”的讹误。

三、用社会语言学的方法调查了大同县方言“入声舒化”

用社会语言学的方法调查大同县方言的“入声舒化”是本书的一大创新，

从方言使用者的社会特征，如地域、年龄、受教育程度等方面来探究“入声舒化”的原因，这种研究思路值得提倡。传统的方言研究注重描写共时的同质的语言，认为在同一个语言社区里，所有的人群在所有的场合，都使用标准统一的语言。社会语言学则研究共时的异质的语言，认为同一种语言系统在内部是不一致的，会因人群、场合、阶层、受教育程度而异。我国方言学家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研究方言已取得了不少成果，黎锦熙在上世纪 20 年代调查过“女国音”，赵元任调查过“惰民”方言，林焘曾调查过北京城区及近郊 55 人的去声连读变调等，但是如何用这种方法研究山西方言至今还处于探索期。晋方言与官话最明显的区别是保留入声，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考察晋方言入声的情况，可以说是一次很好的尝试。晋方言入声保留情况各片并不平衡，“入声舒化”程度各片也不尽相同，学界对此问题大多从语言自身演变的角度来探讨，作者另辟蹊径，运用访谈诱导、间接提问等社会语言学的调查方法，对四个方言小片不同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的对象进行逐一入户调查，通过对 55 个入声字的调查，得出“入声舒化”速度女性快于男性，年轻人快于中老年人，县城居民快于乡村居民的结论。其方法和结论对今后大同方言的研究，乃至山西方言研究都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省内外众多方言研究者的共同开发下，山西方言的平面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迄今共出版方言志 40 余本，120 万字《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1 部、《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5 辑 24 本，发表了大量研究山西方言的论文。可以说，山西方言的平面研究正处在一个丰收期。在此基础上，山西方言的历时研究必将成为今后研究的方向和重点。无论是共时研究还是历时研究，我们鼓励运用多种手段和方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综合运用方言学、地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来研究山西方言，注重学科交叉和学科融合，才能使山西方言研究事业长盛不衰。武玉芳博士《变异研究》一书无疑是一篇研究大同方言的高水平著作，值得肯定。

武玉芳博士是中央民族大学王远新教授的高足，王教授对民族语言、汉语方言诸多领域造诣颇深，由王先生写序顺理成章。但王先生坚持让我来写，理由是武玉芳博士写的是山西大同方言，其实这并不是理由，是王先生太过谦了，我这岂不成了“越俎代庖”？我只是在武玉芳博士写作过程中参与过一次讨论，我首先肯定了这是一个好题目，我说贺登崧 70 年前调查的大同方言，现在到底有多大变化，作为大同附近的人应当引起关注，仅此而已。武玉芳在王先生的严格要求和认真指导下完成了这篇高质量的博士论文。两年

目 录

序	1
山西北部大同方言研究的一篇力作	1
绪论	1
一、大同县概况	1
二、研究目的、意义及研究方法	3
三、大同方言研究概况	6
四、大同县方言分区及部分语言项目的地域分布	7
五、语料来源及体例说明	19
第一章 语音	21
第一节 大同县各方言小片的语音系统	21
一、东南部方言音系	21
二、东北部方言音系	22
三、西南部方言音系	24
四、西北部方言音系	25
第二节 东南部方言声韵调配合关系	27
一、声韵配合关系	27
二、声韵调配合表	28
第三节 东南部方言今音与中古音韵比较	32
一、东南部方言（老派）的音韵特点	32
二、今音与中古音比较	33
第四节 语音差异	44
一、四个方言小片的语音差异	44
二、东南部册田话新老派的主要语音差异	45

三、东南部册田话（老派）和普通话的语音差异	49
第五节 东南部方言（老派）同音字汇	56
第二章 词汇	73
第一节 几个常用词缀	73
一、前缀	73
二、后缀	76
第二节 分音词和合音词	77
一、分音词	77
二、合音词	79
第三节 东南部方言（老派）与普通话词汇比较	79
一、音节差异	79
二、构词差异	80
三、意义差异	81
第四节 分类词表	82
一、天文	82
二、地理	83
三、时令、时节	85
四、农事	88
五、植物	90
六、动物	92
七、房屋、器具	94
八、人品	97
九、亲属	98
十、身体	100
十一、病痛、医疗	102
十二、衣服、穿戴	103
十三、饮食	104
十四、红白大事	107
十五、迷信	108
十六、讼事	108
十七、日常生活	109
十八、交际	110

十九、商业、交通	110
二十、文化教育	111
二十一、游戏	113
二十二、动作、心理活动	113
二十三、位置	115
二十四、代词	116
二十五、形容词	117
二十六、副词	119
二十七、介词等	119
二十八、量词	119
二十九、数字等	120
第三章 副词和代词	123
第一节 副词	123
一、程度副词	123
二、范围副词	125
三、情状副词	126
四、时间副词	129
五、语气副词	133
六、频率副词	139
七、否定副词	140
第二节 代词	140
一、人称代词	140
二、指示代词	158
三、疑问代词	164
第四章 句法	170
第一节 句首的“ <i>pə</i> ”及补正相关研究结论	170
一、研究缘起	170
二、句首的“ <i>pə</i> ”	170
三、句首的“把 [pə?]”	170
四、句首的“不 [pə?]”	174
五、补正贺登崧关于句首“把”的分析结论	178

本节附录	181
第二节 反复问句	182
一、否定词是“不”的反复问句	182
二、否定词是“没”的反复问句	186
三、小结	188
第三节 补语	189
一、趋向补语	189
二、结果补语	195
三、可能补语	198
四、程度补语	199
第四节 体貌系统	200
一、关于体貌及对体助词的判定	200
二、非完整体	202
三、完整体	208
四、小结	209
第五章 中古入声字使用情况的个案调查	211
第一节 调查说明	211
一、调查缘起	211
二、调查方法及内容	212
三、调查程序	213
第二节 西册田村居民入声字使用情况调查	213
一、语言能力	214
二、55个入声字的使用情况	215
第三节 许堡村居民入声字使用情况调查	226
一、语言能力	227
二、55个入声字的使用情况	228
第四节 西坪居民入声字使用情况调查	239
一、语言能力	239
二、55个入声字的使用情况	240
小结	243
余论	244
一、关于调查代表点的选取	244

二、关于调查对象的选取.....	245
三、关于调查方法的运用.....	245
附录	247
附录一 发音合作人简况.....	247
附录二 545 个入声字	249
参考文献.....	251
后记	257

绪 论

一、大同县概况

(一) 地理、行政、人口、资源、交通

大同县位于山西省东北部、大同盆地的中间地带，地处北纬 $39^{\circ}43'$ 至 $40^{\circ}16'$ ，东经 $113^{\circ}20'$ 至 $113^{\circ}55'$ 。东与阳高县友宰、东小村、下深井、朱家窑子头等村庄毗连，北与大同市新荣区的镇川、花园屯两乡接壤，西与南郊区北村乡和怀仁县马辛庄、毛家皂乡相邻，南与浑源县的东水头、吴城、大洼等村紧靠。辖境东西宽43公里，南北长59公里，总面积1503平方公里。全县辖7个乡，3个镇，3个街道办事处，共189个行政村，16个居民委员会。全县总人口17.06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3.48万人，占79%；非农业人口3.58万人，占21%。县城人口3万人。

大同县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县。全县80%以上的地方属富水区，境内的册田水库为山西省第二大水库。御河、桑干河流经境内，是国家实施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项目重点县。大同县资源丰富，已探明的14种矿产资源中，尤其以石灰岩、玄武岩、黏土等资源最为丰富；农产品较为丰富，其中黄花、绿豆以其品质好、产量大而深受国内客商欢迎。

大同县交通十分便利。京包、大秦、大淮三条铁路横贯东西，大涞、大张、大塘、京大四条公路纵横交错。大同飞机场位于大同县倍加造镇境内，距县城15公里。县级公路169公里，实现了县通油路、乡通公路、村村通机动车辆。

(二) 建置沿革及民国后的行政区划变动

1. 历史沿革

战国时，赵武灵王为了适应战争、便于与少数民族作战，变俗胡服，习骑射，扩地千里。大同遂归入赵国的代地。时大同地区有一城邑名平邑，即在今大同县许堡乡东水地村。秦灭六国，统一九州，实行郡县制，划全国为36郡，大同地区名平城、班氏，平城属雁门郡，班氏属代郡。平城之名自秦始。建兴元年，拓跋猗卢定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北）为北都，修秦汉

旧平城为南都，平城复还故治，属代国。北魏，拓跋珪于公元 398 年自盛乐迁都平城。太和十八年迁都洛阳后，置恒州，治平城。孝昌二年，六镇之变，平城陷废。北魏在平城建都长达 97 年，历经六帝七世，平城一直是我国北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北齐，大同为北恒州、北朔州地，属县未有大的变化。北周灭齐后，州县并废，改太平县为云中，此大同称云中之始。

辽，改云中为西京，设西京道大同府，为辽之陪都。重熙十七年析云中置大同县，大同县之名自此始。金，仍以大同为西京，改西京道为西京路，大同县属西京路大同府。元初，大同仍称西京。至元二十五年（1288）改西京道大同府为大同路，大同县属中书省河东山西道大同路。明洪武七年改大同路为大同府，隶属山西行中书省。洪武九年改为承宣布政使司，大同县属山西布政使司大同府。清，初因明治，大同县隶属山西布政司大同府，后属山西省大同府。民国元年（1912），大同废府留县，大同县属北路观察使。民国二年（1913）置雁门道，治大同，大同县属山西省雁门道。民国十六年（1927）废道后，大同为县，直属山西省。从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日战争始，以北同蒲路为界，分西大同、东大同。今大同县属东大同。东大同先后属晋东北十八县政治主任公署、晋东北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晋察冀边区第二专署、晋冀区第五专署、北岳专署、雁北专署，曾建立过“大阳天”、“大阳丰”等县政府。

1949 年 5 月，大同解放，析大同城、郊，置大同市，隶属察哈尔省。1949 年 10 月，东、西大同县合并，属察哈尔省雁北地区。1952 年 12 月，察哈尔省撤销，大同市、雁北地区复归山西省，大同县属山西省雁北地区。1954 年 7 月，大同县与怀仁县合并为大仁县。1958 年，大仁县归属大同市，称大郊区。1960 年，原大同县划为“古城区”，原怀仁县划为“怀仁区”，仍归大同市所辖。1965 年又恢复大同县建制，属雁北地区。1993 年 7 月，雁北地区与大同市合并，大同县归属大同市。

2. 民国以来大同县东南部的行政区划变动

民国时期，东部的东西马营、大石庄、王汉庄、康石庄等村划属天镇。

1942 年 8 月，为控制六棱山区，将大同县龙堡、友宰、东小村、下深井 4 个大村公所划归阳高，划入的村庄有：龙堡、鳌石、曹庄、梁家营、西马营、乱石、榆林、南徐、友宰、坊城、届家窑、小北梁、长嘴梁、桃沟、东团堡、西团堡、东册田、大辛庄、秋林、黄土坡、邓草、老棚等。民国三十四年（1945）5 月建立人民政权时，原大同县东部的神泉堡、赵石庄、下神峪以东部分村庄也已归阳高县管辖。

民国三十六年（1947），阳高被阎军占领。根据形势变化的需要，将东南部一区（鳌石、南徐、曹庄、梁家营、乱石、榆林、东册田、马营、东团堡、西团堡、龙堡、秋林、坊城）、二区（友宰、前贵仁、后贵仁、大辛庄、大王、大王窑、黎峪、南坨子、西册田、堡村）、四区（于家寨、许堡、浅井、邵家皂、阁老山、黄家洼）的部分村庄划归阳高县。1971年7月，原许堡、西册田、阁老山三个公社又从阳高县划归大同县，所划村庄有许堡、浅井、清泉、集仁、上庄、下庄、养老洼、肖家窑头、东水地、西水地、于家寨、鹅毛、南水地（属原许堡公社），南坨子、大王窑、大王、黎峪、西册田、堡村（属原西册田公社）等。

二、研究目的、意义及研究方法

（一）研究目的

本书以大同县东南部方言（老派）为研究对象，从语音、词汇和语法三方面描写和分析了东南部方言的特点，并调查分析了中古入声字在大同县的使用情况。目的有三：

1. 揭示大同县方言内部的差异

1941年7月至1943年3月，著名的方言地理学家、比利时神父贺登崧在大同县东南部、桑干河南岸的西册田村传教的同时，对该区域的方言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桑干河南岸的东、西部方言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都有显著的地域差异，语音方面的差异如：西部方言有5个声调，东部有4个；普通话里的“药”在西部方言里读[yaʔ]^①，在东部方言里读[iaʔ]；普通话里的“爱”在西部方言里读[ne]，在东部方言里读[nɛ]，等等。词汇方面的差异如：普通话里的“昨天”在西部方言里说[iəni (kə)]，东部方言里说[iər (kə)]；“父亲的哥哥”西部叫“老爹”，东部叫“大爷”；“衣服口袋”西部叫“倒衩儿”，东部叫“腰[mi]”，等等。语法方面的差异如：表不可能的动词补语时，西部方言说[pə? tɕiā]（不将），如“念不将来（不会念）”，东部说[pə? tʂā?]（不张），如“念不张来（不会念）”；表进行体的助词东、西部也不一样，西部说“……着呢”，如“正吃饭着呢”，东部说“……的哩”，如“正吃饭的哩”，等等。根据这些差异，贺登崧认为在大同县东南部桑干河南岸地区存在着一条明显的方言边界线，这条线“总体上在河北岸还继续存在，虽然有点向东弯曲，大致方向仍然是向北走的”。（贺登崧，2003：40—41）同时，贺登崧认为西部方言的语言特征接近大同市城区方言。

① 文中引用贺登崧的用例时均照贺当时的标音，一般不做改动。下同。

目前方言学界一般认为大同县方言与大同市方言的差别很小，如《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侯精一、温端政，1993）中的大同方言就包括大同市和大同县方言，已有的研究也大都以大同市城区方言为研究对象。根据贺登崧的调查和我们的调查，可以确定大同方言内部存在差异，尤其是大同县东南部方言和大同市城区方言的差异比较大。我们以大同县东南部方言为研究对象，尽可能详细梳理并充分描写其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特点并与周边县、市方言做比较，揭示大同方言的内部差异，为大同方言内部分区，同时为晋语研究提供、补充更加丰富、翔实的材料。

2. 补正以往研究的一些纰漏

贺登崧在《汉语方言地理学》之作者日译本序中曾说：“我有机会每天请教周围各村的农民，并把自然的语料记录下来。带学生去远足时，也能听学生的自然对话，趁他们不注意时记录下来。那时发现的问题之一是：北京话‘把’的作用是把宾语提到动词前，而在当地可以说‘把狼来了’，放在主语前了。两年半里，我记了43个这样的特殊句子。”（贺登崧，2003）我们查阅了贺登崧发表在《通报》（*T'oung Pao*）42卷1—2号（1953）上，题为 *Initial “pə” in a Shansi Dialect, a problem of grammar*（《句首的“把”：山西方言的一个语法问题》）的这篇文章，对其所记录的部分例句的分析结论产生了怀疑。我们通过对该地区句首“pə”的专项调查研究，补正以往研究的纰漏。

3. 了解入声字使用的社会分层并预测其发展趋势

保留入声是晋语区别于北方官话其他方言的一个典型特征，这个特征从大同开始向东经河北阳原、宣化至北京逐渐减弱甚至消失，在地理空间上的变化比较明显。不仅如此，目前在保留入声的地区，入声字的使用也存在明显的社会分层。我们以入声字使用的社会语言学个案调查为例，通过分析各社会因素和入声字使用的相关程度，找出引起变异的社会动因，并预测其发展趋势。

（二）研究意义

1. 理论意义

（1）传统方言学意义

大同县位于山西省北部，西邻大同市，东与阳高县及河北阳原县毗连，南与浑源县相接，东南部毗连阳高县（历史上曾属大同县）的部分地区，南连广灵县。据《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大同县方言属于晋语大包片，浑源方言属于晋语五台片，阳原方言归属晋语张呼片，广灵方言属于北方官话。由此可见，大同县东南部处于一个方言的过渡地带，而“方言的过渡地带”，

好像语言发展的过渡阶段，在描写研究和比较研究上都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袁家骅等，2001：12）所以，对该区域方言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描写，可以给方言研究提供一个带有过渡性和混合性特点的方言样本，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2）地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意义

贺登崧对该区域的方言地理学研究距今已达 70 年之久。70 多年来，该区域的语言状况是否发生了变化？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变化的过程如何？这些方面是地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都极为关注的课题。贺登崧的研究为我们进行方言变异与变化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对比的真实时间的研究语料，对我们研究该区方言的发展变化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但用来绘制方言地图的语言项目（不论语音、词汇或语法方面）的确定首先是以系统的调查研究为前提和保证的。我们希望本研究能为将来进行该区方言的地理变化和变异研究做基础，这种基础性研究对地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等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

2. 实践意义

（1）有利于方言区普通话的教学和推广

本研究较为全面地描写了大同县东南部方言，并通过与普通话在语音和词汇方面的比较，明确了二者的差别，有利于方言区普通话的教学和推广。

（2）预测入声字使用的发展趋势

入声字使用的社会语言学个案调查，可以揭示入声字在不同年龄、文化程度、城乡等的分化情况，进而预测其发展趋势。

（三）研究方法

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共时描写为主，平面比较、历时比较为辅助手段，力争做到点面结合、动静结合，全面考察与重点挖掘相结合。

1. 调查

调查是本书写作的基础。表格调查是调查方言语音和词汇的主要方法，最常用的调查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的《方言调查字表》和《方言调查词汇表》，但单纯依靠念字表调查，得到的材料并不能反映方言的真实面貌，比如调查“昨天”这个词，如果念字表，大同人（老派）会读作[tsua? tie]，但他们平常只说[ieni (kə)]或[iər (kə)]。所以，我们的语音、词汇调查将采用念字表、直接给发音人看实物或图画、间接询问及隐蔽观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语法调查主要采取例句调查和隐蔽观察相结合的手段，从采集到的自然语料中重点择取一些有价值的例句，在分析的基础上概括方言语